

民国时期 四部英语女性成长小说 中译研究

贺赛波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华中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出版
(项目批准号: 2662017PY048)

民国时期 四部英语女性成长小说 中译研究

贺赛波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四部英语女性成长小说中译研究/贺赛波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307-20777-6

I. 民… II. 贺… III. 英语—妇女文学—小说—文学翻译—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I106.4 ②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3183 号

责任编辑:郭 静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8.5 字数: 264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20777-6 定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性别视角下的翻译批评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引起了较多关注，国内外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在分析对象和批评方法上还要进一步探索。具体而言，以小说翻译研究为例，原文文类有待仔细划分，语言分析对象需找寻新的选择方式，翻译副文本需加强插图等内副文本以及外副文本的系统考察，文本分析比较也要相关理论的指导，某些历史时期的翻译还需要加以更多的关注。本书力图在上述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通过综合运用女性成长小说视角、副文本理论和文体学的相关分析方法，结合民国时期社会女性意识崛起的历史语境，对四部英语女性成长小说在该时期的翻译展开内外结合的翻译批评。

从女性成长小说这一文类视角进行翻译批评，只是众多方法之一，不同方法各有其研究对象、基本原则，研究重点和局限性，它们共存互补，对翻译展开多方位的研究。本书的重点既不是要对具体译文作出评价，也不是去寻求提出这一文类的翻译规则，而是就翻译批评提供一种新的切入视角，希望通过这种文类视角，通过对女主人公成长主线的聚焦，能够帮助拓展翻译批评的思路，并以此帮助加强文学翻译研究中的次文类意识。

绪论部分概述国内外性别视角下的翻译批评现状，阐明相关理论模式对该领域的意义，说明本书的研究对象及其带来的批评局限性、研究方法、意义和基本结构。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考察民国时期女性成长小说翻译的历史语境。与新文化运动之前相比，新文化运动及之后的社会女性意识，在女性的参政权、经济地位、教育平等和婚恋自由意识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高，并折射在文学创作方面，不过女性解放仍然任重道远。这一宏观语境是后面各章个案分

析的背景铺垫。第二章聚焦于《傲慢与偏见》的杨宾译本。校订者吴宓的“序”、讲义和其他文章，体现出他强调模仿原文语言形式对学生心灵的启迪作用以及他对男女平等、女性争取自由人格等话题不同程度的关注；译者杨宾的“评传”和短篇小说表现她对女性婚恋、心理和成长等问题的深入思考。通过详细分析，说明译者采用直译为主的方法，基本上保留了原文的主要文体形式，比较忠实地传递了女主人公的内心变化、能动性等方面的成长特征和成长形象。第三章选取《大地的女儿》林宜生译本进行个案分析。译本封面和标题页两幅插图的设计和寓意，湖风书局的出版特点，献辞对青年男女的鼓舞，杨铨的序等副文本对女性解放话题的探讨，等等，都体现出对语境的强烈呼应。译者采用直译为主的方法，尽力忠于原文语言形式和内容，译本尽管有欠妥之处，但女主人公自立自强的艰辛成长历程，基本上得到了较好的再现。第四章分析了《简·爱》的伍光建译本和李霁野译本。伍译本的序言、增译的目录和章标题，以及大部分外副文本，体现了他对女性主题的进步态度；而对标题的处理有违女主人公的成长形象，少量外副文本也反映出他的保守态度；李译本的副文本信息则呈现出他对女性话题的积极关注。在女主人公逐渐获得能动性等成长特征方面，伍译本在有原则节译人物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基本传递了译者理解的女主人公成长形象；李译则严格按照原文形式和内容，再现了女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第五章探讨了《飘》的傅东华译本。该译本的外副文本信息体现出译者对女性话题的积极探讨。女主人公自主能力逐渐增强的成长主线，在译者既尊重原文特征又充分考虑英汉语差异的翻译特点下，得到了较好的传递。结语部分基于前述分析，提出女性成长小说翻译批评中一些相关的重要问题，并进一步对未来可能进行的研究作出展望。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性别视角下的翻译批评现状	2
一、性别视角下的西方翻译批评	3
二、性别视角下的国内翻译批评	10
第二节 相关理论模式对性别视角下的翻译批评的意义	13
一、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与（性别视角下的）翻译批评	16
二、女性成长小说研究	26
三、文体学与（性别视角下的）翻译批评	37
第三节 研究对象、方法、意义和基本结构	42
一、研究对象及其批评局限性	42
二、研究方法	44
三、研究意义	49
四、基本结构	51
第一章 民国时期社会女性意识的崛起	53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社会女性意识	53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社会女性意识	62
一、参政意识	63
二、经济地位意识	66
三、教育平等意识	71
四、婚恋自由意识	74
第三节 民国时期女性意识的文学折射与典范投射	78
一、文学折射	78

二、典范投射	83
小结	86
第二章 《傲慢与偏见》：成长主线与杨缤译本考察	88
第一节 翻译副文本分析	89
一、吴宓的“序”与外副文本	89
二、杨缤的“评传”与外副文本	98
第二节 《傲慢与偏见》的女性成长小说批评	104
第三节 成长主线与译者的翻译选择	108
一、错误认识后的明智之选	109
二、“视觉领域”的成长	116
小结	123
第三章 《大地的女儿》：成长主线与林宜生译本考察	125
第一节 女性主义主题与语言形式特征	127
第二节 翻译副文本分析	131
一、出版商的内副文本	132
二、献辞	141
三、杨铨的“序”与外副文本	142
四、林宜生的“译后”	145
第三节 《大地的女儿》的女性成长小说批评	147
第四节 成长主线与译者的翻译选择	149
一、自身发展与情感束缚的冲突及选择	151
二、对男女不平等认识的逐步加深	157
三、价值观的变化	164
小结	166
第四章 《简·爱》：成长主线与伍光建译本和李霁野 译本考察	168
第一节 翻译副文本分析	171
一、伍光建译本的副文本分析	171

二、李霁野译本的副文本分析·····	177
第二节 《简·爱》的女性成长小说批评·····	183
第三节 成长主线与译者的翻译选择·····	188
一、视域的逐渐扩大·····	189
二、声音的获得和增强·····	199
三、从被动静态到主动动态的成长·····	205
小结·····	216
第五章 《飘》：成长主线与傅东华译本考察·····	218
第一节 翻译副文本分析·····	221
一、翻译内副文本分析·····	222
二、翻译外副文本分析·····	225
第二节 《飘》的女性成长小说批评·····	227
第三节 成长主线与译者的翻译选择·····	229
一、战前抗拒社会女性规约和呈现自然本性·····	230
二、战时和战后抛弃女性规约和特质、勇担一家之任·····	235
三、重建时期显现男性化的自主能力·····	241
小结·····	246
结语·····	248
参考文献·····	252
附录 英文专门术语中译一览表·····	283
后记·····	285

绪 论

本书将综合借鉴副文本 (paratext) 理论、女性成长小说 (female Bildungsroman)^① 研究以及文体学理论,对民国时期四部英语女性成长小说的中译展开探讨。一方面把女性成长小说视为“性别”与“文类”相结合的场所,另一方面把翻译文本本身、环绕文本的副文本信息以及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开展比较全面的内外结合的翻译批评。^② 在绪论部分,笔者首先综述国内外性别^③视角下的翻译批评现状;然后分别简述相关理论要点,探

① “Bildungsroman”是一个德文词,关于其词根“Bildung”、其近义词以及这一文类的相关定义等方面,请见绪论第二节的“2. 女性成长小说研究”。

② 需要交代的是,翻译批评的客体或对象,一般指译作和译者,有的把过程和影响也包括其中。这些批评对象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没有截然分开。一般来说,进行翻译批评时,研究者会有侧重点,然后再涉及其他方面。其中,杨晓荣提到了另外的翻译批评客体,如某一类作品的翻译批评,或是就翻译选题、翻译政策等问题发表评论。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第60-67页;温秀颖:《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1-107页;文军编著:《科学翻译批评导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第71-145页。

③ “性别”或“社会性别”(即 gender)一词与女性主义运动息息相关。本书是指与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相关的“女性”或“社会女性”,而不是社会性别研究的其他对象范围。Luise von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5-8。另外,笔者主要使用术语“性别”而非“女性主义”(feminist),有以下原因:一、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主要代表作,尤其是标题,主要使用的都是“gender”,如 von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2004; 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转下页)

讨它们在翻译批评中的运用；最后陈述本书的研究对象及其带来的批评局限性、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和基本结构。

第一节 性别视角下的翻译批评现状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兴起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和 90 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等多方面影响下，^①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逐渐发展成为翻译研究这一门广纳其他学科成果之独立学科的重要分支。这一分支探讨的范围比较广泛，总的来看，主要包括相关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等诸多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方面。^②鉴于本书主要探讨性别视角下的翻译批评，所以在综述之前，只对这一分支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做一简要概括。在已有文献中，有的探讨了性别化的理论：洛丽·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等学者揭示出翻译隐喻掩盖了译文和女性分别从属于原文和男性的地位的实质；^③有的强调重新界定传统翻译定义：谢里·西蒙（Sherry Simon）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要确定和批评那些把女性

（接上页）*Politics of Transmissio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二、feminist 一词本身根源于西方社会文化语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流派纷呈（参见穆雷等：《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6 页）；而中国没有经历过女性主义运动，在翻译实践中更少见激进的女性主义特点。因此，为了避免产生歧义，笔者主要使用“性别”一词。

① Von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1, 5-7; 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90);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127.

② 如谢莉·西蒙（Sherry Simon）的著作共五章，第一章和第五章主要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中间三章是案例分析；冯弗洛托著作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Simon 1996; von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2004.

③ Lori Chamberlain, “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314-29; Simon 9-12.

和翻译降格到社会和文学阶梯底层的概念,如翻译的“忠实”等概念;^①有的讨论翻译中的道德:苏姗娜·德·洛特比尼埃-哈伍德(Suz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和西蒙都指出翻译道德问题要与翻译的具体语境结合起来动态地考察;^②有的从翻译实践提炼出具体的翻译策略:路易丝·冯弗洛托(Luise von Flotow)总结了“增补”、“前言和脚注”、“劫掠”三种策略;^③有的强调译者主体性:西蒙和冯弗洛托都重视译者的自我身份及其在译本中的主体创造;^④有的认为翻译是重写和创造:芭芭拉·戈达德(Barbara Godard)指出性别视角下的翻译实践是一种生产活动;^⑤还有的尊重研究内部的多元性:冯弗洛托借用“身份政治”、“位置因素”和“历史维度”这三个术语,解释翻译研究女性主义方法应提倡研究内部的不统一与多样性;^⑥等等。

一、性别视角下的西方翻译批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妇女运动语境激发了对女作家作品的广泛翻译与复译活动;而妇女出版社的发展又为译作出版提供了便利。这一翻译高潮进而促进了翻译批评与分析,以及研究界对“被遗忘”女译者作品的挖掘。^⑦

在性别视角下,西方学者的翻译批评对象涉及多种文类,其中

① Simon 1-2, 12-14.

② Sus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 *The Body Bilingual* (Toronto: Women's Press, 1991) 120-125, 166-168; Simon 35-38.

③ Luise Von Flotow, "Feminist Translation: Contexts, Practices and Theories," *TTR* 4.2 (1991): 76-78.

④ Simon 35-38; von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35-41.

⑤ Barbara Godard, "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 Bassnett and Lefevere 87-95.

⑥ Luise von Flotow, "Dis-unity and Diversity: Feminist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Unity in Diversity?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ds. Lynne Bowker, Michael Cronin, Dorothy Kenny, and Jennifer Pears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3-13.

⑦ Von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49.

大多数是文学文类如诗歌、小说、戏剧、民间故事，少部分是其他文类如女权主义作品、哲学论著，等等。批评者的着眼点也各有侧重。

对文学作品展开的翻译批评中，较多的文献旨在突出译者在序言、译文等方面的主体性。例如，蒂娜·克朗蒂利斯（Tina Krontiris）通过考察玛格丽特·泰勒（Margaret Tyler）所译卡拉霍拉（Diego Ortúñez de Calahorra）著的 *A Mirrour of Princely Deedes and Knighthood*（1578）及译本前言，指出泰勒的前言是“女性主义文学史的里程碑”，因为它不仅是当时由女作家书写的“对父权制意识形态最大胆的批判”，也是18世纪之前论述文学妇女问题的极少数女作者的文献之一。^① 作者还指出，泰勒的译文除了含有“直接和间接与16世纪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相对立的表达”外，其中缺席的成分也同样重要，例如既没有任何表示从属性质的语言，也没有把女性描写成娇美和腼腆的形容词。^② 西蒙则考察了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为托马斯·克里奇（Thomas Creech）的翻译所做的序言以及她翻译的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所著 *Six Books of Plants*（1689）的第六本（Book 6）。作者指出，贝恩在代他人序言中谴责了女性被排除在正统学习之外的社会现象，称赞了译者通过翻译文本的方式使女性读者获得与男性同等学习的机会。^③ 在翻译文本中，贝恩标记在页边空白处的插入文字是“女译者本人说话”，打断了翻译流。西蒙认为这是女译者为了插入自己的声音，讲清自己的信息，以便更好地表达自己是女性、诗人和译者的多重身份。^④ 伊丽莎白·斯皮林（Elizabeth Spearing）分析了贝恩翻译的法国作家保罗·托勒曼（Paul Tallemant）的前后两部 *Voyage*^⑤，指出其翻译的政治不仅体现在贝

① Tina Krontiris, *Oppositional Voices—Women as Writers and Translators of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2) 45. See also Simon 48-49.

② Krontiris 61.

③ Simon 54.

④ Simon 57-58.

⑤ *Voyage de l' isle d' amour* (1663) 和 *Le Second voyage de l' isle d' amour* (1664).

恩对政治内容的反应或增加,还涉及女性参与的多种权力关系;作者发现,贝恩在翻译中除了增加政治材料外,还倾向于添加“性的色彩”(sexual colouring),而且还假装成“男性的人格面具”,更全面地参与文化构建的女性特质(femininity);这样,翻译的政治与性别政治交叉从而产生伪装,在伪装掩护下女译者的权利可以得到充分发挥。^①琳恩·舒特斯(Lynn Shutters)考察了科洛纳(Guido delle Colonne)拉丁作品 *Historia Destructionis Troiae* 于1412—1420年在亨利五世赞助下的英译,译者的翻译目的是为英国民众提供一份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历史准确的本国语记载,从而使他们受益于故事所提供的道德典范;译者不满原文把女性全部描写成欺诈、虚伪的形象,谴责原文作者“反女性主义”话语,因此在翻译中把女性描写为好与坏或真实与虚假两种;舒特斯认为译者要建立好的女性形象是出于政治的原因。^②特雷莎·A·史密斯(Theresa A. Smith)考察了某个西班牙译文,尤其是译者的注释、脚注和文本变化,发现译者不仅借原文的女性主义批评,表达了对女性生存状况等方面的关注(包括她们教育的不足,在婚姻中地位的丧失),还通过对帝国史的处理,颠覆了原文关于西班牙残忍掠夺异域的政治信息,借机阐发了译者心目中的西班牙面貌;译者还通过创造出兼有理性与热情的新女主人公形象,暗指通过宗教的理性与热情(传统上的女性特征)两相调和的模式,来复兴宗教和实现民族的新生,这一调和也包含了女性参与政治的潜力。^③

有的文献探讨译者在目标语文化影响下尽管选取安全保守的翻译策略,但译者的翻译选材却具有颠覆作用。例如,克朗蒂利斯考

① Elizabeth Spearing, "Aphra Behn: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Aphra Behn Studies*, ed. Janet Tod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2, 170, 174, 154-177.

② Lynn Shutters, "Truth, Translation, and the *Troy Book* Women," *Cornitatus* 32.1 (2001): 69-98.

③ Theresa Ann Smith, "Writing Out of the Margins: Women, Translation, and the Spanish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5.1 (2003): 116-143.

察了与泰勒同时代但阶级地位高因而受到更多规约束缚的玛丽·赫伯特 (Mary Herbert) 对加尼尔 (Garnier) 所著戏剧 *Antonie* 的翻译, 发现译者在翻译世俗文学时, 采取“紧扣原文”的翻译策略, 以求在传递原文意义时能寻求保护和避免自己的阐释; 但在选材方面, 译者有意识地选取在当时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里具有“大胆”或“颠覆”思想的文本, 如这部戏剧“质问男性和女性道德的规约定义、反对公然的女性性欲与放荡的道德之间的既定关联、揭露控制政权人士的心理和性的情结 (psychological and sexual complexes)”。^① 尼科莉特·皮雷杜 (Nicoletta Pireddu) 考察了《雅各布的房间》的某意大利译文, 指出译者在翻译中采用隐身的原则, 对高度现实主义的原作实行文体上的归化翻译, 因而其翻译创造了一种文化身份, 这种身份“反映和巩固占支配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倾向的叙述形式和价值观”; 在皮雷杜看来, 译者选译“非规约的外来文本”显示了她希望通过译本带来文化上的变化, 但是其翻译策略却抹去了文本之间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而这又牵涉到女性主义问题; 所以, 作者认为班蒂简化了原作者, 而且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来看, 她也使得原作者的女性主义思想没有在原文中所体现的那么敏锐。^②

有的文献主要考察译者是否具有女性 (主义) 意识 (而非译者的男女性别——笔者注), 以及在译本中的不同体现。例如瓦莱丽·赫尼蒂乌克 (Valerie Henitiuk) 比较分析了一男两女译者对一位日本女性日记 *Kagero nikki* 的英译, 发现女性主义译者索尼娅·阿恩岑 (Sonja Arntzen) 把忠实再现原文内容、尤其是“女性风格”, 作为指南, 保留了原文“分裂的叙述”, 从而在译文中传达了原文的“女性声音”; 而另两位译者 (一男一女) 没有再现原文的女性写作特点, 而是以“(男性) 逻辑叙述流”来翻译, 如增加连接词、填充省略、统一时态, 因而抑制了“女性的声音”。因此

① Krontiris 68-69, 63-78.

② Nicoletta Pireddu, “Modernism Misunderstood: Anna Banti Translates Virginia Wool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56. 1 (2004): 54-76.

作者指出,在翻译这类女性作品时,译者的女性(主义)意识非常重要。^①

有的文献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比较译本之间的差异。例如埃米·莱(Amy Lai)比较了中国作品《酉阳杂俎》中女主人公形象在两个译本中的传递,指出阿瑟·韦利(Arther Waley)的翻译和芭芭拉·克里德(Barbara Creed)的翻译只有少许差别,但前者通过充实原故事中内在的女性潜力而倾向于表达一种“女性主义的张力”(feminist tension);相比之下,后者的翻译呈现出女主人公“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一面。^②

有的文献考察了原文具有性别歧视的语言在译文中的传达以及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例如埃多阿多·克丽莎富利(Edoardo Crisafulli)聚焦于多位英美译者翻译但丁《神曲》中的性别意象时所采取的策略;原文特定的性别意象用来斥责腐败的罗马天主教会,这些意象具有性别歧视的内涵,但大多数译文仍然忠实或充分地传达;作者表明,意大利语和英语的父权制性质是性别意象的使用在文学作品中被容忍甚至被鼓励的原因。作者还进一步探讨了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是否应该为了译文的“政治正确”而改变原文语言的问题。^③

有的文献探讨了女性化的语言形式如何被翻译及其与文类的关系。例如约皮·普林斯(Yopie Prins)考察了希腊抒情诗人萨福(Sappho)的 *Fragment 31* 这首十六行诗片段、尤其是第九行“韵律停顿”(metrical break)在数个英译本中的处理策略。这一停顿是因为第一人称女主人公看到一位男子靠近自己喜欢的女子而心生嫉妒以至于说不出话来。普林斯认为,停顿所隐含的“‘声音’”

① Valerie Henitiuk, "Translating Woman: Reading the Female Through the Male," *Meta* 44.3 (1999): 475-477, 469-484.

② Amy Lai, "Two Translations of the Chinese Cinderella Story,"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15: 1 (2007): 51, 52, 49-56.

③ Edoardo Crisafalli, "Dante's 'Shameless Whore': Sexual Imagery in Anglo-American Translation of the Comedy," *TTR: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Tedaction* 14.1 (2001): 11-35.

由于受到女主人公的情绪干扰而被性别化了，而原文的“文本中断”（textual break）使译本体现成为必然。作者由此认为，翻译把性别与抒情诗文类联系在一起；通过考察“萨福在翻译中后起的生命”（Sappho's afterlife in translation），可以追溯抒情诗这一文类性别化的过程。^①

还有的文献考察了目标语文化对译本的操纵。例如芭芭拉·克劳（Barbara Klaw）探讨了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小说 *Les Mandarins* 的英译，指出一些批评家误认为波伏娃在生活、论文和作品里“简单地重复了父权制传统”，是由于英译者的审查导致的；原作因为“打破性禁忌”而被法国的天主教会列为禁书，但是 1956 年的英译本却受到了不同的待遇，这是因为英译本删掉了两处引起性联想的场景，还为了“减弱性意象的大胆或是加强对按照欲望行事的女性的批评”而改变了数个段落的翻译。^②

除了对文学作品的女性主义翻译批评外，有的学者对其他文类的翻译也展开了批评。有的针对女权主义作品的翻译。例如，玛格丽塔·西蒙斯（Margaret Simons）通过考察霍华德·帕什利（Howard Parshley）英译的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发现帕什利删除了原作百分之十以上的内容，包括历史上 78 位女性的姓名，这种“父权翻译”打破了有影响力妇女的系谱；还删除了女同性恋诗人的爱情诗以及已婚妇女乏味的日常琐事等内容。相比之下，译者却乐于保留显示男性状况和成就等优势段落，译者的删除模式证明了他的性别歧视。西蒙斯认为这些未标明的删节严重地破坏了波伏娃分析欧美 19 世纪选举运动等重要话题的完整性，以及法国社会女性主义的发展，所以为避免混乱，这些

① Yopie Prins, “Sappho's Afterlife in Translation,” *Rereading Sappho: Reception and Transmission*, ed. Ellen Gree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36-67; see also von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61-63.

② Barbara Klaw, “Sexuality in Beauvoir's *Les mandarins*,”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Simone de Beauvoir*, ed. Margaret A. Simon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4, 197, 193-222; see also von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50-51.

删节至少应该做出标记和解释。^①

有的批评针对科学著作的翻译。例如，米雷勒·阿戈尼（Mirella Agorni）考察了由一位女译者1739年翻译的关于科学主题的著作，指出译者为了把原文转变成一本促进女子增长见识、提升女性自我意识的作品，在翻译时进行了性别和文化两方面的操纵：不仅省略了原作中“厌女特征”（misogynous traits）的字眼，还修改了体现社会政治改革的内容；作者还指出，译者尽管运用归化翻译的技巧，但是她采用的是一种“激进颠覆的方式”，从而把原文转变成了一个“原型女性主义的文本”（proto-feminist text）。^②

还有的翻译批评针对哲学论著中相关方面的翻译。例如，克丽丝特·内尔沃尔夫（Christa Knellwolf）在其论文中，用一部分篇幅评论了贝恩翻译的法国哲学家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的著作《谈宇宙多元性》（*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e des mondes habites*, 1686）；作者指出，贝恩在译者序言中，提到翻译此作的理由之一是原文作者引入了一位女性作为作品对话形式的谈话者之一；贝恩对于原作者塑造的女侯爵形象并不满意，她认为作者使女侯爵“说了很多非常愚蠢的事情”；贝恩攻击丰特奈尔是因为他传播了一种女性知识分子的陈规旧习，即由于女性学识很肤浅等原因而容易陷入愚蠢的评论；所以，贝恩对原文做了文体的改变，对女侯爵的形象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改写，简言之，贝恩通过实践一种几乎感知不到的审查干预了原作的性别政治。^③

① Margaret Simons, "The Silencing of Simone de Beauvoir: Guess What's Missing from *The Second Sex*,"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6.5 (1983): 559-64; see also von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49-50.

② Mirella Agorni, *Translating Italy for the Eighteenth Century--Women, Translation and Travel Writing 1739-1797*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84, 86, 56-89.

③ Christa Knellwolf, "Women Translators, Gender and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Translation and Nation: 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ness*, eds. Roger Ellis and Liz Oakley-Brown (Clevedon, England; Tonawanda, NY: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1) 102-107.